



左右之争与大学校政：陈立夫、徐诵明与西北联大法商学院的整顿^{*}

陈 钊

内容提要 抗战初期，西北联大法商学院左翼师生云集，活动频繁，国民党籍师生除重组党部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外，还迭请教育部出手解决。部长陈立夫虽长期执掌党务，起初还是谨守职份，不愿直接出面干涉，而是寄望联大常委徐诵明自行遏制法商学院的左翼化。徐平衡左右的努力未能令陈立夫满意，陈转而派张北海接管法商学院，彻底予以整顿。徐诵明和学院左翼师生对此奋力反对，双方博弈的结果，大批左翼教员被迫离职，张北海也被逼走。徐诵明拔掉了陈立夫敲下的楔子，自己也被调离耕耘 10 余年的大学。在左右之争的大背景下，左翼师生要指点江山，右翼师生要保卫社稷，大学校政难以为继。

关键词 陈立夫 徐诵明 西北联大法商学院 国民党 中共

1938 年冬，教育部部长陈立夫派爱将张北海远赴陕西南部的城固县，取代老资格的许寿裳，执掌国立西北联合大学（为行文方便，以下有时简称“西北联大”或“联大”）法商学院。张北海上任不满一个月就迫使 10 余位教员离职，西北联合大学“党化教育”样板之名，至此传开。^① 陈立夫为何要对一所大学的学院大动干戈？校方又是如何应对的？迄今的相关研究，主要依据《西安临大校刊》《西北联大校刊》等公开出版物、回忆录和少量西北大学档案。^② 由于未能充分运用存世档案，现有研究对陈立夫整顿法商学院的决策过程语焉不详，对西北联合大学主要负责人徐诵明与陈立夫博弈过程的叙述失之简单；事件中陈立夫、徐诵明呈现出的不同于以往研究的面貌未能被揭示

* 本文写作得到南京理工大学特色应用型文科建设计划（AE91319/006）的资助，亦是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中共与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研究”（30916013130）的阶段性成果。

① 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第 7 册，1940 年 3 月 10 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 年版，第 140 页。

② 李永森、姚远主编：《西北大学史稿上卷（1902—1949）》（修订本），西北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49—257 页；方光华主编：《西北联大与中国高等教育》，西北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陈海儒的《西北联大办学困境之研究》（《山东高等教育》2017 年第 2 期）比较充分地运用多方档案探讨西北联大办学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但对以法商学院为中心的左右之争点到为止，未见详细论述。



出来,事件背后左右之争与大学校政之间的持续紧张关系未能得到充分挖掘。^①

有鉴于此,笔者拟以大陆、台湾7所档案馆的档案为基本史料,尤其充分运用度藏于台湾“国家发展委员会档案管理局”的原教育部档案,重建西北联大法商学院巨变的过程,揭示以中共、国民党为中心的左右之争对大学校政的影响和教育部、大学执政者的因应,呈现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大学执政者徐诵明的复杂面貌。

一、法商学院的左翼化

西北联合大学的前身是国立西安临时大学(为行文方便,以下简称“西安临大”或“临大”)。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教育部令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北平研究院合组西安临时大学。该校实行常委会负责制,由北平大学代理校长徐诵明、北平师范大学校长李蒸、北洋工学院院长李书田、北平研究院院长李书华和代表教育部的陈剑脩任常委。^②

1937年11月15日,西安临时大学正式开学,下设文理、法商、教育、工、农、医6个学院23个系。其中,法商学院、农学院、医学院原属北平大学,文理学院由原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和北平师范大学文学院、理学院组成,工学院由北平大学工学院与北洋工学院合组而成,教育学院原属北平师范大学。临大6个学院中北平大学独占其三,23个系主任中北平大学教授占15席。^③徐诵明不仅在临大有相当地位^④,更是对原属北平大学的法商学院等院的事务说一不二。^⑤

法商学院在抗战前就以左翼学者众多、活动频繁而闻名。^⑥因院长白鹏飞“肯于容纳信仰马克

^① 樊中原、胡国台、蒋宝麟等学者均对国共两党在大学中的斗争有精彩论述,参见樊中原《抗战时期三民主义青年团在大中学校活动之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台湾政治大学三民主义研究所,1976年。吴国泰〔胡国台〕:《抗战时期国共两党的校园斗争》,萧秋等:《国外学者评中国共产党》,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2年版;蒋宝麟:《中央大学的国民党组织与国共斗争(1927—1949)》,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3期,2011年9月。有关陈立夫与战时教育的研究见张珊珍的《陈立夫与抗战时期的中国教育》(《抗日战争研究》2006年第3期)、汪伯轩的《陈立夫与战时中国高等教育》(硕士学位论文,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系,2012年)。韩戍的《抗战时期的部校之争与政学关系——以私立大夏大学改国立风波为中心的研究》(《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1期)亦对陈立夫的政治手腕有细腻的描述。有关徐诵明的专题论文极少,讨论的多是其医学研究、教育方面的成就,参见翟立鹏等《中国近代教育家、病理学家徐诵明》,《医学与哲学》2011年第9期;另有人物传记若干,最新的一篇是李海阳的《仁者上医——病理学家徐诵明》(李寻主编:《西北联大知识分子群体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但就笔者管见,此类研究大多脱胎于马力的《徐诵明》(《科学家传记大辞典》编辑组:《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第5集,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48—651页),无论在资料还是观点方面均无新的进展。

^② 《奉谕西安临时大学设常务委员会并指定常务委员及秘书主任函达查照由》(1937年9月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教育部档案,五/2211,第48—49页。李书华未到任,教育部曾令原中央大学法学院院长童冠贤于10月11—25日代李任常委,陈剑脩1938年6月辞职。

^③ 《呈送本大学各处院系主任名单一纸请鉴核备查由》(1937年10月6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教育部档案,五/2211,第7—12页。该件开列学系共计22个,此外尚有原属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的家政系,在该件形成后才并入西安临大。法商学院下设法律系、政治经济系、商学系。

^④ 徐诵明(1890—1991),字毓游,浙江新昌人,1918年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院,1919年回国后历任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北平大学医学院前身)病理学教授、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军医处卫生科长。1928年12月27日获聘北平大学医学院院长,1932年12月开始代理北平大学校长。参见《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第5集,第648页;《国立北平大学聘书第二六四号》,《北平大学区教育旬刊》第3期,1929年4月1日,第62页;《大专院校教职员任免案》,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001/032320006239a。

^⑤ 徐诵明:《西北联合大学的解散》,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24辑,“教育”,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145页。

^⑥ 1934年,北平大学法学院、商学院合并为法商学院。为叙述方便记,本段统称1934年前的法学院和1934年后的法商学院为“法商学院”。

思主义学者”^①,从1931年起,陈豹隐、章友江、侯外庐、李达、许德珩、程希孟、沈志远、曹联亚(曹靖华)等左翼教员陆续来此任教。北平左翼团体发展成员的首选目标之一便是北平大学法商学院^②,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北平分盟、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北平分盟、北平左翼戏剧家联盟等左翼组织也多选择在法商学院举行成立大会。^③为此,国民党党政机关屡次出手,但均未能解决问题。1932年12月中旬,北平市公安局逮捕法商学院教授侯外庐与兼课教员许德珩、马哲民。^④1936年8月,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张厉生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上提议,应令教育部开除白鹏飞、李达、陈豹隐等法商学院7名“反动教授”,“以遏乱萌而正学风”^⑤,只是最后因北平大学代理校长徐诵明的拖延和全面抗战的爆发而不了了之。

北平大学西迁后,法商学院左翼教授虽只来了沈志远、章友江、曹联亚等数人,却未稍减其左翼氛围。沈志远因1934年出版《新经济学大纲》而一举奠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权威的地位,连他的对手也承认沈不仅学问深湛,“授课亦比较认真,青年就学业而言,对渠并无恶感”,于是,沈志远便“利用此点宣传共产,为民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引者注,下同)派张目”。^⑥章友江的学术声望没有沈高,活动能力却极强。1927年,章还在美国留学时就加入美国共产党^⑦,回到北平后活跃于各种左翼社团,只不过因陈豹隐、李达、许德珩等老资格左翼教授在前,章友江一时之间还不显山不露水。北平大学西迁后,陈、李、许诸人未来,性情豪爽的章友江无形中便成了左翼教员的中心。章不仅想办法把法商学院的左翼教员重新聚拢在一起^⑧,还介绍临大学生到延安^⑨,公开指导民先的活动^⑩,令国民党籍师生相当反感。^⑪

更能体现法商学院左翼氛围的是学生的组织和活动。就在临大开学的当月,中共以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学生党员为骨干,成立临大党支部。支部直属中共陕西省委领导,支部书记为法商学院商学系学生刘长崧。1937年12月,法商学院学生、平津流亡同学会负责人郑代巩来到西安复学后,支部书记由郑接任。^⑫

① 侯外庐:《初的追求》,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3页。

② 张磐石:《我所了解的北平左翼文化运动》,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革命史回忆录》第2辑,北京出版社1991年版,第157页。

③ 刘尊棋:《关于“北平左联”》,《北京革命史回忆录》第2辑,第152页;谢荫明:《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北平分盟》,《北京党史通讯》1988年第2期,第29页;北京市西城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西城文史》,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03页。

④ 12月22日,北平大学代理校长徐诵明、法商学院院长白鹏飞等人联手致电国民党中央组织委员会主任委员陈立夫,请求保释侯外庐,未获同意。侯1933年9月出狱后回到山西,再未在北平大学任教。参见《沈尹默、徐诵明、白鹏飞致陈立夫电》(1932年12月22日),北京大学档案馆藏,国立北平大学档案,BP0000214,第1页;侯外庐:《初的追求》,第45—51页。

⑤ 《请转令教育部撤换北平各大学反动教授案》(1936年8月18日),台北,中国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藏,会议记录,会5.3/18.24。

⑥ 《国立西北联大法商学院院务报告》(1938年10月5日),新北,“国家发展委员会档案管理局”藏,教育部档案,A309000000E/0027/140.48-22/0001,第191页。

⑦ 徐绫之:《徐永燮与美共中央中国局》,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资料》2003年第3期,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年版,第171页。

⑧ 季陶达:《我在西大的日子里》,《西北大学校史资料汇编》第1辑,西北大学校史编写组1987年编印,第65—67页。

⑨ 中共西安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西安历史(第1卷1921—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232页。

⑩ 李昌伦:《抗战时期西北联大学生革命斗争片断回忆》,《西北大学校史资料汇编》第1辑,第119页。

⑪ 《为呈请彻底整顿西北联合大学法商学院改正青年思想以利党前途事》(1938年8月12日),新北,“国家发展委员会档案管理局”藏,教育部档案,A309000000E/0027/140.48-22/0001,第156页;《为西北联大法商学院教授章友江、沈志远言行反动,院长许寿裳包庇延揽,为反动派张目,再愿彻查改组,俾维抗教而树党权由》(1938年10月28日),新北,“国家发展委员会档案管理局”藏,教育部档案,A309000000E/0027/140.48-22/0001,第162页。

⑫ 中共西安市委组织部等编:《中国共产党陕西省西安市组织史资料1925.10—1987.10》,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6页。

郑代巩为人沉着老练,在南京中学读书时便组织了数次学生运动,1936年考入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商学系俄文先修班后,很快成为北平学生运动的骨干。^①郑到西安临大后,除担任临大党支部书记外,还被选为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学生会主席。^②同时,郑还是陕西省各界抗敌后援会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学生支会的常委。抗敌后援会本是国民党发起、主导的团体,但12月17日临大学生支会成立时^③,常务委员3人中有2人是中共党员,1人是民先队员;委员9人中,中共党员2人,民先队员4人,只有牛传钦是国民党员、CC系外围组织诚社的骨干,因此,临大学生支会在中共和民先的掌控之中,详见表1。

表1 陕西省各界抗敌后援会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学生支会职员简况表^④

职务	姓名	原就读大学	支会成立时政治面貌	
委员	张恩泽	北平大学农学院	1936年上半年暑假前参加民先,后退出	
	徐国启	北平师范大学	中共党员	
	郑代巩	北平大学法商学院	中共党员	
	杨龙兴	北平大学农学院	民先队员	
	牛传钦	北平师范大学地质系	国民党员	
	邹高清	北洋工学院	民先队员,临大时期加入中共	
	钱万生	北洋工学院	民先队员,临大时期加入中共	
	阎应清	北平师范大学(?)	不详	
	刘天民	北洋工学院	民先队员,临大时期加入中共	
候补委员	鹿崇文	北平大学法商学院	民先队员	
	孟培元	北平大学法商学院	参加“一二·九”运动	
	艾弘毅	北平师范大学	不详,1949年后去台	
常务委员	徐国启	北平师范大学	中共党员	
	郑代巩	北平大学法商学院	中共党员	
	杨龙兴	北平大学农学院	民先队员	
总务股	股长	张恩泽	北平大学农学院	1936年上半年暑假前参加民先,后退出
	干事	刘天民	北洋工学院	民先队员,临大时期加入中共
		孟培元	北平大学法商学院	参加“一二·九”运动

① 许立群等回忆,徐健竹、苏农观整理:《怀念郑代巩同志》,《中华英烈》1989年第4期。

② 宗群:《宗群文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96页。宗群在校时名钱万生。

③ 《临大抗敌支会成立》,《民意报》,1937年12月18日,第3版。

④ 《西安临大校刊》第8期,1938年2月7日,第12页;《国立北平大学一览》,国立北平大学校长办公处1936年编印,第570页;《中国共产党北京农业大学组织史1921—1937》,中共北京农业大学委员会党史资料征集小组1990年编印,第72页;张仲葛:《中国近代高等农业教育的发祥——北京农业大学创业史实录》,北京农业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43页;《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8,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1993年编印,第143页;河北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河北文史资料》第24辑,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18—122页;彭子光主编:《河北师范学院志》,教育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43页。中共天津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一二·九运动在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53页;《商丘文史资料》第3辑,商丘市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2004年编印,第92—214页;《枣庄文史资料》第3辑,枣庄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89年编印,第27页。

续表 1

职务	姓名	原就读大学	支会成立时政治面貌
组织股	股长	郑代巩	北平大学法商学院
	干事	阎应清	北平师范大学(?)
		钟国梁	北平师范大学文学系
宣传股	股长	徐国启	北平师范大学
	干事	邹高清	北洋工学院
		杨龙兴	北平大学农学院
训导股	股长	钱万生	北洋工学院
	干事	鹿崇文	北平大学法商学院
调查股	股长	牛传钦	北平师范大学地质系
	干事	左恺	北洋工学院
募捐股	股长	黄蔚光	北洋工学院
	干事	艾弘毅	北平师范大学

除郑代巩外,法商学院参加“一二·九”运动的骨干彭桂梁(彭友今,中共党员,原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学生会主席)、牛曾修、孙承佩等学生都回到临大,加上北平师范大学的肖远健、北洋工学院的钱万生等人^①,以及全校的 200 余名民先队员^②,一时之间,西安临大、特别是法商学院中共猛将云集,各项活动大张旗鼓地进行。以致几年以后,还有学生很自豪地说:“临大所有一切活动都归我党所领导。”^③

学校地处西安也大大方便了法商学院左翼师生活动的开展。西安不仅有中共常驻机构八路军办事处,而且因为接近陕甘宁边区,中共党政军群人士往来各地多从此过,左翼师生借地利之便,得以与中共重要人物有直接接触。1937 年 12 月 17 日,周恩来借西安中山大街(今东大街)北侧基督教青年会场所,邀请各界代表 300 余人举行座谈会,法商学院政治经济系学生、临大民先队负责人郭有义和另一位民先队员获邀参加。^④三天后,彭德怀在西安师范学校讲《目前抗战形势与今后的任务》^⑤,听众 6000 余人中自然少不了西安临大法商学院左翼学生的身影。^⑥1938 年 3 月初,丁玲

① 廖提双:《彭友今传》,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14 年版,第 52 页;牛克伦(牛曾修):《从北平大学到抗大——纪念“12·9”抗日救国运动六十周年》,北京抗大光荣传统研究会编:《抗大精神永放光芒》第 1 集,长征出版社 2003 年版;《二十六年法商学院学籍册》(原件无年月),甘肃省档案馆藏,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档案,33/001/0280,第 144 页。

② 《西安报告——民族解放先锋队最近情形》(1937 年 12 月),《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 10,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 1992 年编印,第 132 页。

③ 《陕西省委统战部关于国立西北大学概况调查材料整理》(1941 年 8 月 24 日),《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 18,第 140 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02 页;《周恩来谈目前抗战形势与任务》,《民意报》,1937 年 12 月 19 日,第 3 版;《中国共产党西安市委员会志(1925.10—2002.7)》,中共西安市委办公厅 2004 年编印,第 60 页;郭有义:《地下工作十五年》,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6 页。

⑤ 徐焰主编:《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99 页;《彭德怀讲目前抗战形势与今后任务》,《民意报》,1937 年 12 月 26、27 日,第 3 版。

⑥ 袁式鉴(法律系学生):《“振中国剧社”的发起经过及鼎盛时期》,尹雪曼编:《国立西北大学建校三十周年纪念刊》,台北,国立西北大学校友会 1969 年印,第 73 页。傅道义:《老校长徐诵明和国立西北大学》,王周昆主编:《西北大学英才谱》第 3 辑,西北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85 页。

率西北战地服务团来到西安。3月4日,西安文化界20余人在莲湖食堂宴请丁玲,法商学院教授沈志远、曹联亚作陪,同席的还有刚从临汾前线来到西安的前法商学院教授侯外庐。^①3月11日,沈志远在青年会主持以“保卫西北”为主题的讨论会,侯外庐也参加。^②民先队组织队员在西安举行游击战演习时,也能就近请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军事人员进行指导。^③

这种局面的形成,除了与国共两党组织能力、党员信仰的差异有关外,也与两党基层组织的构成不无关系。中共大学党支部多以所在机关为单位建立^④,机关在,组织就在,所以在大迁徙中能很快恢复组织,聚拢群众,投入战斗。而国民党在全面抗战爆发前,规定以居住地而非所在机关为单位划分基层组织。^⑤一般来说,设在大学的区分部、区党部中,既有大学师生,也可以包括校外党员。这种组织模式,容易使居住地发生变动时导致原有组织解体,到了新的地方又需要征得当地党部同意后方可重建党部。西安临大设立后,一些国民党员虽然对中共和左翼师生的活动极为不满,但因一时之间找不到组织,只能各自为战。

二、联大区党部的崛起与徐诵明的应对

国民党组织的恢复,是西安临大开始南迁以后的事。1938年2月底临汾失陷后,西安临大奉令南迁,3月16日启程,3月底到陕南城固县,校本部即设于城固县城,4月2日改名为西北联合大学。^⑥

在北平时,法商学院的左翼名声已令代理校长徐诵明处境尴尬。私底下徐还透过同乡汤恩伯,向蒋介石提议整顿北平各大学政治经济系教授。^⑦全面抗战爆发,北平大学西迁,左翼教授泰半未到西安,徐诵明觉得“整顿之时机已至”,打算“遵照中央意志切实改革”。^⑧中共也观察到,北平大学西迁后,徐诵明“拒绝和排斥原来的北平的老教授,如李达、程希孟等,把学校的院长和系主任都让给一些国民党员,如尹文敬(四川人,CC)任政治经济系主任”,只有沈志远“以徐诵明同乡得来

① 《李公朴丁玲昨赴欢饗 本市文化界公宴》,《西北文化日报》,1938年3月5日,第2版。

② 杜运辉:《侯外庐先生学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61—62页。

③ 《中国共产党西安历史(第1卷1921—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232页。

④ 参见李里峰《革命政党与乡村社会: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形态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49页。

⑤ 《区分部划分办法》(1928年5月17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第4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87—288页;《中国国民党区党部划分办法》(1928年6月25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第5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1页。1936年9月3日曾微调区分部划分办法,但直到1938年12月22日决定在大学设立直属区党部前,国民党在大学的组织形态基本未变。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第21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06页。

⑥ 《该校应改称国立西南、西北联合大学由》(1938年4月2日),新北,“国家发展委员会档案管理局”藏,教育部档案,A309000000E/0026/140.48/0001,第80页;《教育部公报》第10卷第4、5、6期合刊,1938年6月30日,第49页。行政院4月3日通过的《平津沪战区专科以上学校整理方案》有“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及国立北洋工学院,原联合组成西安临时大学,现为发展西北高等教育,提高边省文化起见,拟令该校院逐渐向西北陕甘一带移布,并改称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李永森、姚远主编的《西北大学史稿上卷(1902—1949)》(修订本)(第216页)与刘基主编的《西北师范大学校史(1902—2012)》(教育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6页)等书据此认定西北联大成立的日期为4月3日,不确。《平津沪战区专科以上学校整理方案》拟定日期远早于西北联大成立的日期,还在1938年3月23日,国防最高会议常务委员已审议通过该案。参见《国防最高会议常务委员会第六十一次会议纪录》,台北,中国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藏,会议记录,会00.9/8。

⑦ 《汤恩伯电蒋中正据徐诵明意见本年庐训最好调训北平各大学政治经济系教授及韩复榘有攫取青岛企图等文电日报表》(1937年6月1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一般资料·呈表汇集(五十六),002/080200/00483/074/001x。

⑧ 《徐诵明致陈立夫函》(1938年10月10日),新北,“国家发展委员会档案管理局”藏,教育部档案,A309000000E/0027/140.48-22/0001,第231页。

学校”。^①但接踵而来的人事纠葛和左右之争完全打乱了徐诵明的部署。

临大成立后,校方最初宣布任命的法商学院院长是余荣昌,但余未能西来,空出来的院长职位便成为各派力量的竞逐目标。政治经济系主任尹文敬四处活动,“亟思取得法商学院院长一职”。尹是国民党员,其基本群众也是国民党籍师生,教员方面主要有政治经济系教授吴西屏,讲师于鸣冬、康伦先、孙宗钰,法律系教授王治焘、李宜琛等人。学生方面,则由生活指导委员会主席杨立奎指导“国民党学生对尹表示拥护”。^②不过,西安临大时期,一盘散沙的国民党面对组织起来的中共和左翼师生,不知如何是好,尹派人马“态度消极”。直到联大区党部成立,局面才为之一变。

据中共党员观察,西北联大的国民党员在杨立奎领导下,在南迁城固的路上已开始筹组区党部。^③至迟到1938年4月28日,西北联大已有国民党区党部筹备机构,负责人之一为牛传钦。^④5月1日,联大国民党学生党员正式组建直属陕西省党部的区党部,并在各学院设区分部^⑤,到7月,联大区党部已有党员120余人^⑥,活动中心是法商学院。^⑦这大概是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在大学中建立的第一家直属省党部的区党部。截至1939年中央直属区党部成立前,直属陕西省党部的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区党部已发展至28个区分部,拥有党员380人,下设常务、组训、宣传、青运四股,编有《精诚》半月刊,另设节约运动委员会、消费合作社。^⑧

国民党“由无组织到有组织,有〔由〕无群众到少有群众”,力量逐渐凝聚在一起,相比之下,中共支部的活动能力和影响却在下降。联大南迁后,中共联大党支部改归汉中地委领导,临大时期的骨干,诸如郑代巩、彭桂梁,不是奔赴抗战前方,就是去了延安,留下来的多是“比较能力弱一点的同志”,支部的战斗力大受影响。^⑨

国民党联大区党部甫一成立,就发起对左翼教员、中共及其外围组织的进攻。1938年5—6月

① 《陕西省委统战部关于国立西北大学概况调查材料整理》(1941年8月24日),《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8,第142、166页。中共学生党员的这一判断虽非空穴来风,但似不完全如此。左翼教授未到的原因各有不同,陈豹隐入了蒋介石的军事委员会参事室,程希孟和许德珩都做了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参见许德珩《许德珩回忆录——为了民主与科学》,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第187页。

② 《西北联大发生驱逐反动教授风潮之前因后果》(1938年10月17日),新北,“国家发展委员会档案管理局”藏,教育部档案,A309000000E/0027/140.48-22/0001,第209页。

③ 《陕西省委统战部关于国立西北大学概况调查材料整理》(1941年8月24日),《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8,第141页。杨立奎,北平师范大学物理学系教授,在北平时以指导“新学联”(北平学生联合会)与左翼学生主持的旧学联(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相抗衡而闻名学界。参见乔家才《杨立奎独立斗学联》,《浩然集(四)——海隅丛谈》,台北,中外图书出版社1981年版,第495—507页。

④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纪录》(1938年4月28日),陕西省档案馆藏,国立西北大学档案,67/1/205,第47页。

⑤ 《关于请求发给房屋事宜给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古路坝分院院务委员会的公函及西北联大青年团的成立宣言》(1938年)5月8日,原件无年份,此系引者据该区党部致联大文理学院、教育学院、工学院便函所载日期判断,甘肃省档案馆藏,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档案,33/001/0461,第16页。

⑥ 《汉中工作报告》(1938年7月7日),《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0,第395页。

⑦ 《陕西省委统战部关于国立西北大学概况调查材料整理》(1941年8月24日),《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8,第171页。

⑧ 《中国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直属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区党部党员名册》(1939年),陕西省档案馆藏,国立西北大学档案,67/1/4,第72—99页。《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组织工作》下册中引用的《八中全会中央组织部工作报告》称,西北大学1940年7月前报到的党员只有5人,恐不确。参见李云汉主编,林莽志编辑《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组织工作》下册,台北,国民党党史会1993年版,第409页。

⑨ 郑代巩于1938年春被调到武汉,负责筹备恢复“一二·九”运动时建立的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彭桂梁于1937年底被陕西省委调到延安学习。参见《陕西省委统战部关于国立西北大学概况调查材料整理》(1941年8月24日),《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8,第142—143页;许立群等回忆,徐健竹、苏农观整理:《怀念郑代巩同志》,《中华英烈》1989年第4期;廖提双:《彭友今传》,第56页。

间,区党部数次向徐诵明反映法商学院“反动势力高涨”,请徐采取措施。^①徐未闻风而动,令一班党部中人相当不满。徐诵明自有其不得已之处,此时的中共和左翼力量,虽然失去了临大时期领导一切的风光,实力仍不可小觑。据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的情报,法商学院150名学生中,左翼学生达87名,国民党员和接近国民党的学生只有50余人;教员中,属于左翼阵营的也超过一半。^②何况深受徐倚重的法律系主任黄得中,其群众基础也是左翼师生。眼见院中左右两派力量相持不下,徐诵明干脆自兼院长。^③

徐的担忧还不止于此。徐诵明、黄得中虽然是国立大学校长、系主任,也都是国民党员,但对他们来说,关键不在于手下的师生是不是(国民)“党”的人,而在于是不是“我”的人。联大国民党区党部指导员牛传钦、赵金铭、吕明甫、邵辅周、邓运生5人中,只有赵金铭来自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其他4人全出自北平师范大学。区党部对北平大学、特别是法商学院的攻击,难免让北平大学校方认为北平师范大学有所企图。何况,区党部的舵手杨立奎也是北平师范大学教授,这如何能让徐诵明不心生警惕?除此之外,据蒋鼎文手下的观察,图谋法商学院院长的尹文敬还通过教育学院院长李建勋与常委李蒸暗通款曲,这让徐诵明“认尹为李蒸之内应”,加深了徐对北平师范大学的戒心。^④

6月底至7月下旬,教育部改组联大,工学院、农学院独立设置,分别称西北工学院、西北农学院^⑤,工学院院长李书田转任西北工学院筹备委员会主任,教育部增补原重庆大学校长胡庶华为联大常委,凑足3人之数。在胡未到任前,徐诵明、李蒸都加紧布局。7月13日,李蒸提拔北平师范大学出身的汪如川任秘书处秘书。20日,同为北平师范大学出身的黎锦熙任联大秘书处主任,徐诵明则让出法商学院院长职务,请浙江同乡、历史系主任许寿裳兼任。^⑥

许寿裳(1883—1948),字季黻,浙江绍兴人,1908年毕业于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在日本时与鲁迅成为挚友,同人章太炎门下。民国成立后,许历任教育部普通教育司第三科科长、大学院秘书长、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校长,1934年7月起任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院长。

联大文理学院的半壁江山来自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由许任法商学院院长,徐就能抓住联大剩余的法商、医学、文理、师范四学院的两个半(法商、医学院的全部^⑦,文理学院的一半),仍可在联大保持优势地位。许寿裳虽然因鲁迅的关系,与曹联亚等左翼教员过从甚密,但平日言行并无党派色彩,加之长期在教育行政机关和大学任职,又是老同盟会会员、章太炎门生,资格之老,在

^① 《为西北联大法商学院教授章友江、沈志远言行反动,院长许寿裳包庇延揽,为反动派张目,再恳彻查改组,俾维抗教而树党权由》(1938年10月28日),新北,“国家发展委员会档案管理局”藏,教育部档案,A309000000E/0027/140.48-22/0001,第161页。

^② 《西北联大发生驱逐反动教授风潮之前因后果》(1938年10月17日),新北,“国家发展委员会档案管理局”藏,教育部档案,A309000000E/0027/140.48-22/0001,第208—209页。

^③ 李毓珍:《我和西北大学》,《西北大学校史资料汇编》第1辑,第69页。

^④ 《西北联大发生驱逐反动教授风潮之前因后果》(1938年10月17日),新北,“国家发展委员会档案管理局”藏,教育部档案,A309000000E/0027/140.48-22/0001,第209页。需要说明的是,西北联大常委徐诵明、李蒸虽然互相防范,但直至1939年8月联大被拆,双方关系尚未发展到内斗的地步。相反,面对两任教育部长王世杰、陈立夫加强统制的企图,双方还常常联手应对。1937年10月,徐李即联手挤走王世杰派来的西安临大筹备委员会常委童冠贤。参见《教育部致西安临时大学筹委会电》(1937年10月25日)、《教育部致童冠贤电》(1937年10月26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教育部档案,五/2211,第115、60页。

^⑤ 详见拙文《陈立夫与西北联大的改组》,《民国档案》2015年第3期。

^⑥ 《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纪录》(1938年7月20日),陕西省档案馆藏,国立西北大学档案,67/3/402,第59页。《许寿裳先生年谱》系于27日,这是就职日期而非任命日期。参见北冈正子等编《许寿裳日记,1940—1948》,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0年版,第463页。许此时仍兼历史系主任一职,9月16日交由李季谷担任,参见《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常务委员会第四十次会议纪录》(1938年9月16日),陕西省档案馆藏,国立西北大学档案,67/3/402,第68页。

^⑦ 此时的医学院院长是徐诵明一手提拔的蹇先器。

西北联大无人能出其右。所以,徐诵明估计“另一派教授,看到许先生德高望重,也不好反对”。^①果然,许出任法商学院院长的消息公布后并未引起波澜,国民党籍学生甚至还和左翼学生联合开了欢迎会。

不料,许寿裳一上任,便“把反动的××(政经)(政治经济系的简称——引者注)主任尹文敬降为教授,委沈志远为主任,把坏教授吴西屏(吴正华,字西屏)解职,极力聘请好教授”^②,令国民党籍师生措手不及。时在法商学院任职的国民党籍讲师于鸣冬回忆说:

许就职后,要求常委会停发爱国教授吴西屏等的聘书,并新聘一些“共匪”党员邓和〔初〕民、吴清友、彭迪先等为教授,因他获得常委徐诵明的支持,常委会予以同意。因此,西北联大大学顿时充满了陕北抗日大学的气氛,思想纯正的教授们和学生们在精神上感受很大的威胁。^③

彭迪先的应聘经历颇为奇特。1938年春夏间,正当彭四处谋取大学教职时,其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同学、西北联大法商学院商学系主任寸树声来信,邀其来城固任联大法商学院政治经济系副教授。得到消息后,彭即回“眉山老家全力备课”。不料又接寸树声一信,称“为了在该校法商学院的教授中加强左派力量以利对右派教授的斗争”,改聘彭为教授。^④10月26日,联大第46次常务委员会(以下简称“常委会”)追认了这一聘约。^⑤

这一系列举措引起国民党籍师生的极大不满,在杨立奎策划下,联大区党部发起驱逐许寿裳,挽留尹文敬、吴西屏的活动。^⑥用杨立奎的话来说,“此次之事,为国民党与C. P. 在联大之最后斗争,若不能胜利,则国民党将被逐出联大”。8月10日,国民党籍学生贴出“驱许宣言”。^⑦12日,联大区党部给教育部发去2000字的详细报告,历数法商学院是怎样变成“马列主义者之会聚地,共产党之养成所”的。^⑧同时,区党部还派赵金铭、张良珍到重庆向教育部请愿,派吕明甫、邹辅周到西安向省党部反映情况。

收到区党部的报告后,陈立夫最初还是想依靠西北联大当局处理纠纷。9月5日,陈立夫批示:“应严令该校对于法商学院切实加以整顿。”^⑨9月6日,教育部致电西北联大常委徐诵明、李

① 李毓珍:《我和西北大学》,《西北大学校史资料汇编》第1辑,第70页。

② 《两个月来联大的一般的情况简述》(1938年11月3日),《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1,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1992年编印,第216页。尹文敬在4月28日曾表示辞职,但未获同意。见《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纪录》(1938年4月28日),陕西省档案馆藏,国立西北大学档案,67/1/205,第46—47页。

③ 于鸣冬:《忆西大》,尹雪曼编:《国立西北大学建校三十周年纪念刊》,第17页。

④ 彭迪先:《我的回忆与思考》,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8页。

⑤ 《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常务委员会第四十六次会议纪录》(1938年10月26日),陕西省档案馆藏,国立西北大学档案,67/3/402,第87页。

⑥ 《两个月来联大的一般的情况简述》(1938年11月3日),《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1,第216页;《据报西北联大法商学院暨天水国立甘中发生风潮情形电请注意由》(1938年9月13日),新北,“国家发展委员会档案管理局”藏,教育部档案,A309000000E/0027/140.48-22/0001,第155页。

⑦ 《西北联大发生驱逐反动教授风潮之前因后果》(1938年10月17日),新北,“国家发展委员会档案管理局”藏,教育部档案,A309000000E/0027/140.48-22/0001,第212—213,211页。

⑧ 《为呈请彻底整顿西北联合大学法商学院改正青年思想以党国前途事由》(1938年8月12日),新北,“国家发展委员会档案管理局”藏,教育部档案,A309000000E/0027/140.48-22/0001,第203页。

⑨ 《顾毓琇张道藩致陈立夫电》(1938年8月26日),新北,“国家发展委员会档案管理局”藏,教育部档案,A309000000E/0027/140.48-22/0001,第154页。



蒸、胡庶华,称“法商思想复杂”,要求联大“将下学年教授人选慎重选聘,并将办理情形报部备案”。^①这说明陈对徐诵明还有起码的信任,还是希望徐诵明自己动手解决问题,教育部暂时还不准备亲自上阵。

徐诵明也在努力寻求左右平衡,既满足教育部的要求,又不致对左翼师生刺激太甚。8月中旬,徐诵明还在武汉向教育部请示工作,听说沈志远介绍左翼教授邓初民到西北联大,导致本已紧绷的左右对峙形势更形紧张,徐“深感不安”,随即“去电解聘”。即便是自己的基本班底,徐诵明也愿意做出一些牺牲。区党部和王治焘、李宜琛等人猛攻许寿裳,徐诵明一面致函陈立夫,称赞许寿裳“品端学粹,素为全校同人所钦仰,在北平时长女子文理学院三载,成绩尤著”;一面又与胡庶华私下商定,可以设法使许“知难而退”,条件是教育部同意徐重新兼任法商学院院长。政治经济系主任本已内定沈志远,这时也予以取消。徐甚至出主意,请教育部“迅电联大,命沈志远、章友江赴部一谈,使速离学校”,至于调虎离山之后,“是否另予位置,请部酌办”。沈、章因为实在太“红”,徐诵明不得不忍痛割爱,但对于不以“红”著称的黄得中、寸树声,徐却一力回护。黄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与徐是“大高同学”^②,寸是徐诵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的校友,二人是徐的左膀右臂。王治焘等人说黄得中不仅缺课率极高,上课也极不认真,还常在课堂上讲不雅的话。徐诵明就说法律系因聘请教授困难,黄得中“担任义务课程甚多”。王治焘等人说寸树声才学不足,徐诵明就在向教育部汇报简历时特意在备考栏注明寸“(曾)在日本研究经济,人颇干练,上年度担任商学系主任,尚称平妥”。^③

徐诵明还未雨绸缪,于9月10日宴请南郑警备司令祝绍周、中央军校第一分校政治部主任林树恩等地方要人,解释联大内部纷争的原由。祝、林与徐、许是浙江老乡,加之不明联大内部情形,故对联大的左右之争“多抱调解态度”。^④

三、张北海彻底整顿法商学院

然而,徐诵明的努力还是未能令陈立夫满意。在接连收到陕西省主席蒋鼎文和联大法商学院法律系教授王治焘、政治经济系讲师孙宗钰的法商学院院务报告后,教育部的态度开始改变。

10月21日,教育部收到蒋鼎文的《西北联大发生驱逐反动教授风潮之前因后果》。这份3000余字的报告没有区党部8月份报告中情绪化的叙述,而是相对客观地分析了法商学院教员及学生的派别、校常委之间的矛盾和国民党区党部发起驱逐左翼教授风潮的经过。常务次长张道藩在报告上批示:

^① 《西北联大发生驱逐反动教授风潮之前因后果》(1938年10月17日),新北,“国家发展委员会档案管理局”藏,教育部档案,A309000000E/0027/140.48-22/0001,第212页。

^② 日本学制,高等学校毕业升入帝国大学,在这一系统的不管是否同校学习,统称大高同学。参见郑伯奇《忆创造社》,王延晖、王利编:《中国文学史资料全编 现代卷 9 郑伯奇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版,第77页。

^③ 《徐诵明致陈立夫函》(1938年10月10日),新北,“国家发展委员会档案管理局”藏,教育部档案,A309000000E/0027/140.48-22/0001,第230—232页;《胡庶华、张北海致陈立夫电》(1938年10月14日),新北,“国家发展委员会档案管理局”藏,教育部档案,A309000000E/0027/140.48-22/0001,第175、249页;《为呈复奉发二十七年渝涪7742密代电声述情形请鉴核》(1938年10月14日),新北,“国家发展委员会档案管理局”藏,教育部档案,A309000000E/0027/140.48-22/0001,第172—173页。徐诵明:《西北联合大学的解散》,《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24辑,“教育”,第146页。徐诵明几十年后回忆,是“校委会将邓等聘书暂行搁置不发”,而非徐本人的主意。

^④ 《西北联大发生驱逐反动教授风潮之前因后果》(1938年10月17日),新北,“国家发展委员会档案管理局”藏,教育部档案,A309000000E/0027/140.48-22/0001,第213页。

西北联大法商学院内部纠纷情形,各方面报告大体相同,情势十分严重,拟请从速决定调整办法。^①

5天后,王治焘、孙宗钰撰写的长达7000余字的《国立西北联大法商学院院务报告》到达教育部。王、孙的报告在区党部8月份报告的基础上更进一步,除了继续攻击沈志远、章友江等左翼教授,更将火力集中于法律系主任黄得中、商学系主任寸树声。报告说,黄得中虽自称国民党忠实信徒,私下却“力为章沈等声援”;寸树声不仅“与章沈等互相勾结”,而且其主持的商学系,“学生十之八九皆为民先分子”。因此黄、寸不除,即便沈志远不任政治经济系主任、章友江解聘,左翼师生“在黄、寸掩护之下……仍可卷土重来也”。王、孙建议教育部对法商学院“全盘改造,另立新基”,非此不足以使“黑暗势力下之忠实教员学生得以重见天日”。^②看到这两份报告后,陈立夫下定决心,不再假手徐诵明,要派嫡系人马,彻底改造法商学院。

陈立夫的王牌是张北海。张曾任北平师范大学社会科学系讲师、CC系外围组织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董事、秘书长,曾推动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北平、天津分会成立,与北平师范大学、北平大学理工农科教授多有交往^③;张还担任过中央宣传部电影事业处处长,与左翼文人斗争经验丰富。这是陈立夫看中张的客观原因。除了这些条件,张北海还是CC系的一员干将,梁实秋评价道:“张北海先生是部里的一位干员,任何地方学校有纠纷,总是派他去大刀阔斧的彻底解决,而能不辱使命。”^④

还在1938年5月6日,教育部即派张北海视察陕甘高等教育^⑤,7月,张北海首次到城固视察西北联大。8月1日,教育部令张兼任西北工学院筹备委员会委员。8月20日,应西北工学院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李书田之请,教育部委张为“监交委员”,代表教育部监督、调解联大拆分事宜。9月中下旬,张北海再次来到城固,监督联大与西北工学院的移交、接收。张北海既是中央代表,又是CC系核心的身份,使其迅速成为城固炙手可热的人物,连常委胡庶华也愿意在处理联大左右之争时间问计于张。^⑥经过数月经营,张北海不仅熟悉了联大人事,而且隐然成了联大国民党各派势力的共主。

11月初,工学院、农学院移交接收事务基本结束,时机成熟,陈立夫下出改造法商学院的关键一着。5日,教育部电令西北联大以张北海为联大校务委员会委员。^⑦10日晚间,徐诵明明告许寿裳:

教育部长陈立夫氏有密电致联大常务委员会,主法商学院长须超然而接近中央者,指定常委

① 《据续报西北联大法商学院风潮发生之前后情形特抄同原件请设法补救》,新北,“国家发展委员会档案管理局”藏,教育部档案,A30900000E/0027/140.48-22/0001,第206页。

② 《国立西北联大法商学院院务报告》(1938年10月5日),新北,“国家发展委员会档案管理局”藏,教育部档案,A30900000E/0027/140.48-22/0001,第198页。

③ 《天津文史参考资料简辑16 国民党CC法西斯组织罪恶活动述略》,天津市政协秘书处1978年编印,第17页。

④ 梁实秋:《百年梦忆:梁实秋人生自述》,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161页。梁时受教育部常务次长张道藩之邀,担任教育部教科书编辑委员会中小学教科书组主任。参见梁实秋《百年梦忆:梁实秋人生自述》,第150页。

⑤ 《教育部公报》第10卷第4、5、6期合刊,1938年6月30日,第35页。

⑥ 《胡庶华、张北海致陈立夫电》(1938年10月14日),新北,“国家发展委员会档案管理局”藏,教育部档案,A30900000E/0027/140.48-22/0001,第249页。

⑦ 《加派张北海先生为校务委员(电令二)》,《西北联大校刊》第6期,1938年12月1日,第6页;《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常务委员会第四十八次会议纪录》(1938年11月12日),陕西省档案馆藏,国立西北大学档案,67/3/402,第91页。

会聘张北海氏为过渡人,整理法商学院。^①

许一听之下,极为愤慨,立即辞职。12日,联大常委会第48次会议批准许寿裳辞去法商学院院长一职,同时聘其为校建筑设备委员会主席,以示安慰,改“聘张北海先生为法商学院院长”。^②

陈立夫的这一着大出徐诵明的意料之外。徐本以为大步退让可换来陈立夫收手,不料结果完全相反。显然,陈的这一着动摇了徐诵明的根基。至此,徐手下几无可统之将。校本部三处中,秘书处主任黎锦熙出身北平师范大学;教务主任张貽惠虽曾任北平大学工学院院长,但与北平师范大学也颇有渊源;训导处主任则由常委胡庶华兼任。^③各学院中,文理学院院长刘拓出身北平师范大学,师范学院院长由常委李蒸兼任,再除去法商学院院长张北海,徐能指挥得动的只剩下医学院院长蹇先器,差不多成了光杆司令。11月11日,无路可退的徐诵明致电陈立夫,提出辞职:

诵明来陈述职年余,毫无建树,有负付托,常用愧惧。今校局稍定,一切正待发展,如再恋栈不去,必貽覆餗之讥,务祈准予辞去西北联大校委兼常委职务,另聘贤能接替。

末了,不忘加上一句“法商学院许院长已辞职照准,谨闻”^④,明示辞职原因。同一天,徐致函联大常委会请假一个月,不再出席会议。^⑤

徐的辞职,引起西北联大上下不安。常委会第48次会议后,胡庶华马上致电陈立夫,请其务必慰留徐诵明。由教务主任张貽惠领衔的医学院院长蹇先器等77名原北平大学教员也联名致电教育部:

徐常委诵明长平大七年,认真治理,劳怨不辞,厥功甚伟。抗战以还,率学子跋涉千里,秉承部旨,经营擘划,劳绩实多,顷闻突电大部辞职并离城固,令人不胜惶悚。窃念国难益亟,寇患益深,后方教育尤为急务,大学常委岂可轻易?大部高瞻远瞩,谅早鉴及。同人职责攸关,岂

^① 许世瑛:《先君许寿裳年谱》,北冈正子等编:《许寿裳日记,1940—1948》,第464页。笔者翻检陕西省档案馆藏国立西北大学全宗、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教育部全宗、台北“国家发展委员会档案管理局”藏教育部档案,暂未发现此封密电,但在教育部给行政院的一份签呈的草稿中,有“交下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法商学院教授寸树声等请维持该院商学系俄文课程函一件,等因;奉此,查本部前以该院内容复杂发生风潮,故令该校加以改组,聘请张北海为院长,以期整顿院务,调整课程,而增进教育效能”等语,其中“令该校加以改组,聘请张北海为院长”一句,证明教育部确曾下过密令。(双删除线部分是签呈起草者删去的话——引者注)参见《奉交寸树声等请维持西北联大法商学院商学系俄文课程函签鉴核由》(1939年1月12日),新北,“国家发展委员会档案管理局”藏,教育部档案,A309000000E/0027/140.48-12/0001,第48页。

^② 《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常务委员会第四十八次会议纪录》(1938年11月12日),陕西省档案馆藏,国立西北大学档案,67/3/402,第92页。11月24日,教育部为缓解矛盾,下令加聘许为校务委员。参见《加聘许寿裳先生为本校校务委员》,《西北联大校刊》第7期,1938年12月15日,第7页;《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常务委员会第五十三次会议纪录》(1938年12月9日),陕西省档案馆藏,国立西北大学档案,67/3/402,第101页。

^③ 《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常务委员会第四十次会议纪录》(1938年9月16日),陕西省档案馆藏,国立西北大学档案,67/3/402,第67、70页。

^④ 《徐诵明致陈立夫电》(1938年11月11日),新北,“国家发展委员会档案管理局”藏,教育部档案,A309000000E/0027/140.48-01/0001,第41页。

^⑤ 《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常务委员会第五十次会议纪录》(1938年11月25日),陕西省档案馆藏,国立西北大学档案,67/3/402,第95页。

敢缄默？为国家为教育，均恳大部即电挽留。^①

此时，张北海立足未稳，拥徐群体显得阵容强大，教育部自不便遽然解除徐诵明的职务。因此，眼见挽徐电报纷至沓来，陈立夫顺水推舟，于16日回电徐诵明：

真电备悉，校务进行诸赖共济，尚希努力孟晋，勉为其难，切勿遽萌退志。不胜企盼。^②

陈立夫一方面挽留徐诵明，另一方面照旧强力支持张北海整顿法商学院。徐诵明见以退为进的办法无法奏效，干脆请假“赴渝面陈校务”。^③

11月份，当张北海与徐诵明缠斗正酣时，联大另一常委、北平师范大学原校长李蒸赴重庆出席全国高级师范会议，不在现场。12月初回到城固不久，李蒸就在西北联大第55次常委会上主动提议“加聘张北海先生为社教推行委员会委员”。^④ 毕竟，法商学院院长易人，矛头所向是徐诵明。^⑤ 相比几成光杆司令的徐诵明，李蒸还牢牢控制着师范学院，守住了北平师范大学的老底子，无论从北平师范大学的未来还是个人前途考虑，李蒸都没有与陈立夫公开唱对台戏的必要。

内无同侪支持，外有陈立夫布下的天罗地网，走投无路的徐诵明只得暂时鸣金收兵，于1939年1月初回到西北联大，继续在常委的位子上苦熬。连联大区党部也注意到，“徐常委诵明见于形式改变，态度好转”。^⑥

1938年11月21日，张北海正式就职。上任伊始，张北海便将整顿目标聚焦于商学系。早在10月5日，法律系教授王治焘、政治经济系讲师孙宗钰就在给教育部的《国立西北联大法商学院院务报告》中，明确提出商学系的存废问题：

商学系之设，在北平[大学]商学院归并法学院之后，商学院原为俄文法政学校改组而成，故今日之商学系仍以俄文为第一外国语，该系学生十之八九为民先分子。前在北平时有精通俄文之王之相、刘绍周等主持系务，尚能造成俄文人才，迁陕以后俄文旧教授皆未来陕，而商学系不幸入于寸树声之手，酿成非驴非马之局面。寸树声九州帝大出身，在北平时系以副教授监管图书事务，无教书之资格，更无主任之才能，对于商学既为门外汉，而俄文更一字不通。到陕以后，徐诵明以大高同学关系畀以此席，寸一面拉拢章友江、沈会春（沈志远）等左派分子藉以自重，一面联络稍通俄文之李绍鹏以资对付，于是商学俄文两俱废弛，而所谓商学系者，竟成共

① 《张貽惠、蹇先器致陈立夫电》（无发电日期，教育部1938年11月15日收到），新北，“国家发展委员会档案管理局”藏，教育部档案，A309000000E/0027/140.48-01/0001，第38—39页。

② 《陈立夫致徐诵明电》（1938年11月16日），新北，“国家发展委员会档案管理局”藏，教育部档案，A309000000E/0027/140.48-01/0001，第40页。

③ 《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常务委员会第五十四次会议纪录》（1938年12月14日），陕西省档案馆藏，国立西北大学档案，67/3/402，第103页。

④ 《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常务委员会第五十五次会议纪录》（1938年12月21日），陕西省档案馆藏，国立西北大学档案，67/3/402，第105页。

⑤ 李溪桥编：《李蒸纪念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9页。

⑥ 《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法商学院改组情况报告书》（1939年3月2日），新北，“国家发展委员会档案管理局”藏，教育部档案，A309000000E/0027/140.48-22/0001，第244页。

产主义之根据地矣。^①

张北海甫一上任,就宣布取消商学系办的俄文先修班,并声称要逐渐结束商学系俄文课程。商学系师生闻讯奋起,几天之间,先后致电教育部、蒋介石,要求制止张北海。^②他们还发动曾任陈立夫秘书的校友张冲、时任中苏文化协会常务理事的校友张西曼,乃至立法院院长孙科向陈立夫说项,陈均不为所动。^③

要彻底铲除左翼教员的影响,釜底抽薪之计当属解聘。11月30日,上任不到20天的张北海,根据教育部的要求^④,向联大第51次常委会提出一个教员更动名单,一举解聘多名左翼教员。出席会议的胡庶华、黎锦熙(代李蒸)、张貽惠(代徐诵明)对解聘“无名小卒”商学系教授刘及辰、讲师张云青和政治经济系副教授韩幽桐没有异议。^⑤但讨论到政治经济系教授章友江和商学系教授寸树声、曹联亚的去留时,与会者发生了严重分歧。虽然张北海视章为“反动首要”,教育部也暗示不能续聘,但由于黎锦熙坚决反对解聘章友江,最后常委会决议章友江“给假一年(自廿七年八月一日起至廿八年七月底止)研究抗战政治问题”。黎锦熙也不同意直接解聘寸树声,认为这样“予人难堪”,有失大学体统,不如降为讲师,黎相信这样一来,寸树声“必自动辞职”。对于曹联亚,张北海必欲去之而后快,商学系是待不下去,黎锦熙便接纳其到国文系当讲师。沈志远已在重庆生活书店谋得职位,因此主动提出辞职,常委会本拟挽留,经张北海、胡庶华联手力争,会议最终通过其辞职申请。^⑥有些教员政治色彩并不浓厚,但因属徐、黄阵营,日子也越来越难过,最后不得不了一了之。法律系主任黄得中的江西老表、曾任法商学院事务室主任、时为法律系副教授的吴英荃便是如此。^⑦十几天后,看不惯张北海作为的商学系俄文教授李绍鹏也主动提出辞职。^⑧陈立夫打进西北联大的这个楔子,一出手就将法商学院搅得天翻地覆。

① 《国立西北联大法商学院院务报告》(1938年10月5日),新北,“国家发展委员会档案管理局”藏,教育部档案,A309000000E/0027/140.48-22/0001,第193页。

② 《敬恳速电制止北海先生结束商学系俄文课程》(无发电日期,教育部1938年11月26日收到),新北,“国家发展委员会档案管理局”藏,教育部档案,A309000000E/0027/140.48-12/0001,第40—41页。《为国立西北联大法商学院教授寸树声等暨商学系同学会呈称该院院长张北海声言结束俄文商学系俄文课程电请鼎力维护由》(1938年12月16日),新北,“国家发展委员会档案管理局”藏,教育部档案,A309000000E/0027/140.48-12/0001,第66—69页。

③ 《张冲呈陈立夫笺》(1938年12月31日)、《张西曼致陈立夫函》(1938年12月16日)、《孙科致陈立夫函》(1938年12月8日),新北,“国家发展委员会档案管理局”藏,教育部档案,A309000000E/0027/140.48-12/0001,第72—92页。

④ 《马继援对李绍鹏等来电的签呈》(1938年11月30日),新北,“国家发展委员会档案管理局”藏,教育部档案,A309000000E/0027/140.48-12/0001,第39页。

⑤ 张云青曾留学苏联。参见徐士瑚《九十自述(续)》,《山西文史资料》1999年第5期,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99年编印,第172页。

⑥ 《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常务委员会第五十一次会议纪录》(1938年11月30日),陕西省档案馆藏,国立西北大学档案,67/3/402,第98页;《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法商学院改组情况报告书》(1939年3月2日),新北,“国家发展委员会档案管理局”藏,教育部档案,A309000000E/0027/140.48-22/0001,第241—242页;《陕西省委统战部关于国立西北大学概况调查材料整理》(1941年8月24日),《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8,第81页;《马继援对李绍鹏等来电的签呈》(1938年11月30日),新北,“国家发展委员会档案管理局”藏,教育部档案,A309000000E/0027/140.48-12/0001,第39页;沈骥如:《卓越的马列主义传播者——沈志远传略》,《经济日报》主编:《中国当代经济学家传略(一)》,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75页。西北联大对章、曹二人相对温和的处理遭到教育部批评,教育部专门下令,要求“嗣后不得援例办理”。参见《据呈报致送辞职教授沈会春请假教授章友江等薪给办法指令知照》(1939年3月1日),陕西省档案馆藏,国立西北大学档案,67/2/64,第55页。

⑦ 吴英荃在1938年4月20日的第25次常委会上被委为法商学院事务室主任兼文书,参见陕西省档案馆藏,国立西北大学档案,67/3/402,第11页。

⑧ 《李绍鹏致常委会函》(1939年1月11日),陕西省档案馆藏,国立西北大学档案,67/2/72,第12页。

陈钊 / 左右之争与大学校政:陈立夫、徐诵明与西北联大法商学院的整顿

表2 法商学院左翼教员离职简况表^①

姓名	离职前职位	离职原因、日期	离职后简况
寸树声	商学系教授兼主任	1938年11月解聘。	1939年初在文理学院、医学院任课,同年冬返回家乡云南腾冲,任私立益群中学校长。
曹联亚	商学系教授	1939年3月停薪。	1938年12月25日当选中苏文化协会候补理事,1939年2月11日离开城固赴重庆。
李绍鹏	商学系教授	1939年初辞职。	经徐诵明挽留,留在联大,1939年9月离开。
刘及辰	商学系教授	1938年11月30日解聘,1939年2月停薪。	1940年任国立教育学院教授兼社会事业系主任。
方铭竹	商学系讲师	1939年3月停薪。	1940年任国立中正大学经济系教授。
张云青	商学系讲师	1938年11月30日解聘,1939年2月停薪。	1939年5月任陕西省石泉县县长。
夏慧文	商学系讲师	1939年3月停薪。	不详。
彭迪先	政治经济系教授	1938年11月解聘。	1939年秋经徐诵明推荐任国立编译馆馆外编译,1940年9月任武汉大学教授。
沈志远	政治经济系教授	1938年11月30日辞职。	离校后到重庆,1939年2月任生活书店编审委员会副主席。
章友江	政治经济系教授	1938年11月30日常委会给假一年研究抗战政治问题,1939年2月停薪。	1939年夏离开城固到中苏文化协会任职。
韩幽桐	政治经济系副教授	1938年11月30日解聘,1939年2月停薪。	1939年3月到重庆,任全国救国会常委,在中共领导下从事民主运动和妇女工作。
吴英荃	政治经济系、法律系合聘副教授	1938年11月解聘。	1939年入职陆军大学,任政治教官。
黄得中	法律系教授兼主任	1938年12月9日辞法律系主任,仍任教授。	1939年9月16日与徐诵明、许寿裳等一起离开城固县赴成都。

^① 《为法商学院商学系教授刘及辰政经系副教授韩幽桐商学系讲师张云青等三人应予解聘,薪俸均送至廿八年一月底止通知查照》(1938年12月10日)、《法商学院商学系教授曹联亚准辞薪俸送至二月底止分函查照》(1939年2月3日),陕西省档案馆藏,国立西北大学档案,67/2/54,第23—24、175、225页;《为呈复奉发二十七年渝漾7742密代电声述情请鉴核》,新北,“国家发展委员会档案管理局”藏,教育部档案,A309000000E/0027/140.48-22/0001,第165页;《胡庶华致陈立夫函》(1939年9月22日),新北,“国家发展委员会档案管理局”藏,教育部档案,A309000000E/0028/140.14-01/0001,第47页;许世瑛:《先君许寿裳年谱》,北冈正子等编:《许寿裳日记,1940—1948》,第465页;曹清华:《曹清华译著文集》第11卷,河南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19页;《中苏文化协会第三次年会会务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文化”(2),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510页;惠才凤:《忆夫君方铭竹》,《江西文史资料》第50辑,江西省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1993年编印,第199—205页;方克立等主编:《二十世纪中国哲学 第二卷:人物志》上册,华夏出版社1994年版,第400页;彭迪先:《我的回忆与思考》,第50页;张起钧:《怀念至友吴英荃》,《新时代》第4卷第8期,1964年,第34页;陈荷夫编:《张友渔回忆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98页;黄纯艳等:《追緬寸树声同志》,云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43辑《风雨同舟专辑》(2),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8页;北京印刷学院、韬奋纪念馆编:《〈店务通讯〉非印本》(中册),学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926页;徐士瑚:《九十自述(续)》,《山西文史资料》1999年第5期,第172页;兴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兴平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69页。《西北大学史稿上卷(1902—1949)》(修订本)等论著多用解聘13位教授的说法,不确。首先,上述著作中提到的季陶达并未被解聘,也未离职,参见季陶达《我在西大的日子里》,《西北大学校史资料汇编》第1辑,第65—67页;李绍鹏、黄得中、沈志远也不是被解聘,而是辞职,因此被解聘、停薪的实际是10人。其次,对教员等的叙述不正确,离职的13人不全是教授,也有副教授、讲师。

为争取中立师生,在解聘左翼教员的同时,张北海特意聘请政治色彩不浓的北平大学元老江之泳、刘泽荣分任政治经济系和商学系主任。^①同时,张也不忘拔擢拥戴自己的国民党籍教员,政治经济系讲师孙宗钰直升商学系教授,王治焘在江之泳未到前代理政治经济系主任,李宜琛在刘泽荣未到前代理商学系主任。^②

张北海还到处新聘教员,建立自己的班底。就在第51次常委会上,张北海提出聘请曾就学于朝阳大学法律系、并在日本留过学的荆磐石担任法律系讲师。^③1939年2月,经张北海提议,联大常委会同意法商学院聘请徐褫夫为商学系俄文教授。^④

然而张北海自建班底的布局并不顺利。张北海聘请巴黎大学法学博士陶秀为政治经济系教授、吴我怡为专任讲师,但二人水平有限,不但遭到左翼学生点名批评^⑤,国民党籍学生也觉得他们“教书无方”。^⑥因此,两人到校不久均称病辞职。^⑦吴我怡在给张北海的信中说:“来院月余,方期尽棉[绵]薄以达盛意。不幸因气候关系,旧病复发,须即就医,且非短期所可痊愈,一时不克返校,敬乞另简贤能,免误生徒学业。”^⑧

旧教授不愿上课,新教员退避三舍,法商学院几陷停顿,埋头读书者深受其害,反对者也找到罩门。在中共的推动下,学生们行动起来。1939年1月9日,教育部政务次长顾毓琇来城固视察,12日法商学院学生结队到顾的住地请愿。^⑨17日,105名法商学院学生上书联大常委会,痛陈张北海任院长以来的乱象,并提出三项要求:

(一)请确定新教授到院之日期。窃忆新院长在生院未开课之前即昭示生等,谓其所聘之教授已从重庆各地首途,不日可以到院,嘱生等忍耐云云。但屈指月余,仍无确信(其中甚至有已就他处职务者)。如云道路阻隔,决不至如此遥遥无期。似此望梅止渴画饼充饥之情形,是生等不能再忍而有请钧会赐予答覆者一。

(二)请彻底整顿法商。生院新院长自云革新以来,尚有多数滥竽之教授充数其间,此种事实不独有违教部整顿法[商]之原则,抑且有失教部整顿法商之威信。生等为学业计,深恳钧会以严明迅速之处理,立即解聘如吴我怡、贾万一、康正午、于鸣冬、刘景向等,是生等有请钧会赐予答覆者二。

(三)请设法添置生院图书。窃以生院图书所藏甚少,报章杂志更为缺乏,各科既无固定

① 《兹聘先生为法商学院政经、商学系主任希惠允担任》(1938年12月24日),陕西省档案馆藏,国立西北大学档案,67/2/54,第31页。

② 《本校第五十三次常会议决聘王治焘暂代政治经济系主任李宜琛暂代商学系主任函请查照》(1938年12月23日),陕西省档案馆藏,国立西北大学档案,67/2/54,第32页。

③ 周启贤:《海外骄子——老学长荆磐石博士的光灿历程》,薛君度等主编:《法学摇篮:朝阳大学》(增订版),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240页。

④ 《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常务委员会第六十一次会议纪录》(1939年2月1日),陕西省档案馆藏,国立西北大学档案,67/3/402,第120—121页。

⑤ 《李昌伦等致陈立夫电》(1939年1月2日),新北,“国家发展委员会档案管理局”藏,教育部档案,A309000000E/0027/140.48-22/0001,第220—221页。

⑥ 《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法商学院改组情况报告书》(1939年3月2日),新北,“国家发展委员会档案管理局”藏,教育部档案,A309000000E/0027/140.48-22/0001,第244页。

⑦ 《法商学院政治经济系教授陶秀专任讲师吴我怡均因病辞职照准分函查照》(1939年2月9日),陕西省档案馆藏,国立西北大学档案,67/2/54,第80页。

⑧ 《吴我怡致张北海函》(1939年1月28日),陕西省档案馆藏,国立西北大学档案,67/2/54,第84页。

⑨ 赵弘毅、程玲华主编:《西北大学大事记》(修订本),西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9页。

课本，讲义亦复不全，且城固地处偏僻，文化食粮供给困难，坐井观天，孤陋奚似，是生院有请约会赐予答覆者三。^①

自1939年初返回城固后，徐诵明虽因情势所迫选择蛰伏，却也没有完全缴械投降，而是随时等待出击的机会。见到法商学院学生105人的呈文，徐诵明、李蒸在原呈第一条顶部批：“转函张院长，催促新聘教员早日到校。”彻底整顿法商一条，只有徐诵明批“学校聘请之教员，不能任意解约，且亦非学生所得请求，所请应勿庸议”。而“设法添置生院图书”一条则由徐、李、代胡庶华职务的文理学院院长刘拓作出批示：“本校各学院图书现在陆续向国内外订购，关于本校设备一切，本校自能通盘筹划，该生等勿庸顾虑。”三条批示看似四平八稳、不偏不倚，却借力使力，以一句“转函张院长，催促新聘教员早日到校”，将学生的压力转给张北海。^②3月14日，张北海致函常委会，以法商学院“情形特殊”为由，请求7月底前不扣授课钟点未达聘约要求的教授、副教授和专任讲师的薪水。对此，常委会搬出聘书，称此事“与本校一般聘书规定不合，于本校经费影响亦巨”，没有直接同意，将球踢给教育部，请教育部裁夺。^③

反对张北海的非只中共和徐诵明。张北海出掌法商学院院长，也引起校内国民党复兴系力量的不满。张北海由“监交委员”而正式“落户”西北联大后，CC系力量得到整合，势力空前强大，“有些排斥复兴的倾向”，于是出现复兴系与中共联合反对张北海的奇特现象。实际上，直到1939年3月初，联大区党部还对复兴系领袖杨立奎赞誉有加。^④然而，当3月份三民主义青年团陕西支部部筹备处成立的消息传来后^⑤，事情开始起变化：

复兴逐渐趋于反张北海（CC首领），要求与我党合作，我党乃与之联合进行掀起了反张北海的斗争，由复兴在前领导（主要是康派），我党来参加。开始，复兴黑夜贴标语，提出“打倒张北海”、“反对破坏学校的张北海”等等口号，当时群众都卷入。张北海的一套特务作风，在同学中影响特别坏，大多数同学都不满意张北海，以后张北海无法，乃走。^⑥

至迟在1939年7月3日，张北海已决定辞去法商学院院长职务。^⑦5日，张的辞呈获联大第80

① 《李昌伦、王家骥等呈常务委员会》，陕西省档案馆藏，国立西北大学档案，67/2/66，第44—50页。原件无日期，初步判定该件应于1月17日上交常委会。依据1：胡庶华13日还主持第58次常委会，16日起请假离校，而此件只有徐诵明、李蒸的批示，无胡庶华的，故应在胡离校后上呈；依据2：批示日期为1月17日，根据西北联大常委办公的一般做法，文件一般是当天批完，极少有文件拖上几天后再批的。故该件很可能是17日上呈的。

② 此件上呈时，正值胡庶华外出。见《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常务委员会第五十九次会议纪录》（1939年1月18日），陕西省档案馆藏，国立西北大学档案，67/3/402，第116页。

③ 《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常务委员会第六十七次会议纪录》（1939年3月30日），陕西省档案馆藏，国立西北大学档案，67/3/402，第133页。《为据法商学院院长签请该院情形特殊教授等授课钟点有不足额者不予扣薪办法展至七月底止呈请核示由》（1939年4月3日），陕西省档案馆藏，国立西北大学档案，67/2/64，第75—78页。5月10日，联大收到教育部的指令，同意展期。参见《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常务委员会第七十二次会议纪录》（1939年5月10日），陕西省档案馆藏，国立西北大学档案，67/3/402，第145页。

④ 《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法商学院改组情况报告书》（1939年3月2日），新北，“国家发展委员会档案管理局”藏，教育部档案，A309000000E/0027/140.48-22/0001，第245页。

⑤ 《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临时常务干事会一年来工作报告（民国二十七年七月九日至二十八年七月九日）》，台北，中国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藏，一般档案，一般519/123。

⑥ 《陕西省委统战部关于国立西北大学概况调查材料整理》（1941年8月24日），《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8，第131页。

⑦ 《李蒸、徐诵明、胡庶华致戴修瓚电》（1939年7月3日），陕西省档案馆藏，国立西北大学档案，67/2/67，第11页。

次常委会批准。消息传开,CC系教员、学生齐声反对。在常委会批准张北海辞职的当天,李宜琛、孙宗钰就致电陈立夫,说“法商学院久为反动份子盘据,岁无宁日,国人交责,士林耻之”,经张北海院长“艰难劳苦”的整顿,才有如今局面,“昨悉院长辞职离院,同深骇叹”。^① 区党部的白希安也盛赞张北海任院长以来,“反动气焰渐次除清”,并说听到张北海辞职的消息后,“生等若失南针,不胜慌悚”。双方均指张北海去职,是“极少数党员假借小组织勾结民先”发动风潮的结果。^② 所谓“小组织”者,复兴系是也,这与中共的记载一模一样。

陈立夫也不想让张北海就此退出。接连收到支持张北海的电报后,陈即于7月中旬通知胡庶华,已改任张为联大常委^③,为了降低敏感度,还专门搭配上在联大口碑不错的陈剑脩。

然而,陈立夫担心的事还是很快上演,“平大对于陈先生(陈剑脩)无问题,专攻张先生(张北海)”。^④ 被折腾了半年多的徐诵明好不容易看到曙光,如何能让张北海继续留在联大? 8月1日,徐与李蒸联名致电陈立夫,直指“北海长法商数校,纠纷迭出”,若以张北海为常委,校务恐怕就无法进行。^⑤ 同时,徐、李分别找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旧人,准备集体签名请求教育部撤换张北海。徐诵明还亲赴南郑,发动医学院起来反张。^⑥ 然而,张北海在联大任职近一年,布局岂止法商学院,连徐诵明的起家之地联大医学院,也已改旗易帜。1939年6月初,支持徐诵明的医学院原院长蹇先器因看不惯张北海的作为,“不屑为伍”,愤而辞职,徐佐夏取而代之。^⑦ 据徐诵明回忆,徐佐夏正是张北海力荐的。^⑧ 关键时刻,徐佐夏果然不负厚望,8月5日,徐致电陈立夫,斩钉截铁地保证:

敝院同人对钧部最近整顿西北联大命令绝对拥护,对于徐常委诵明之主张力表反动[对],除俭电欢迎张常委外,其余一切有违钧部意旨之文电如同人列名者,均系假借,专电奉

① 《李宜琛等致教育部电》(1939年7月5日),新北,“国家发展委员会档案管理局”藏,教育部档案,A309000000E/0027/140.48-22/0001,第96页。

② 《邓季直等致陈立夫电》(1939年7月6日收),新北,“国家发展委员会档案管理局”藏,教育部档案,A309000000E/0027/140.48-22/0001,第97页。

③ 笔者未能找到这封电报。该电发电日期当在7月14—21日之间。14日,教育部致电西北联大,只是同意张北海辞去法商学院院长职务,未提任张为常委一事;21日,总务处文书组的谭文伯就向教育部秘书张廷休报告,任命张北海、陈剑脩为常委的电报已到联大。参见《教育部致西北联合大学电》(1939年7月14日),陕西省档案馆藏,国立西北大学档案,67/2/66,第113页;《谭文伯致张廷休函》(1939年7月21日),新北,“国家发展委员会档案管理局”藏,教育部档案,A309000000E/0027/140.48-22/0001,第113页。

④ 《谭文伯致张廷休函》(1939年7月21日),新北,“国家发展委员会档案管理局”藏,教育部档案,A309000000E/0027/140.48-22/0001,第115页。

⑤ 《徐诵明李蒸致陈立夫电》(1939年8月1日),新北,“国家发展委员会档案管理局”藏,教育部档案,A309000000E/0027/140.48-22/0001,第99—100页。

⑥ 《张北海致陈立夫电》(1939年8月4日),新北,“国家发展委员会档案管理局”藏,教育部档案,A309000000E/0027/140.48-22/0001,第104页。

⑦ 《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常务委员会第七十九次会议纪录》(1939年6月28日),陕西省档案馆藏,国立西北大学档案,67/3/402,第161页;《徐佐夏致联大常委函》(1939年8月14日),陕西省档案馆藏,国立西北大学档案,67/2/66,第58页。蹇先器对张北海的看法参见《蹇先器等致陈立夫电》(1938年12月8日),新北,“国家发展委员会档案管理局”藏,教育部档案,A309000000E/0027/140.48-22/0001,第223页;厉商华:《回忆陈礼节》,《杭州文史资料》第7辑,杭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1986年编印,第11页。厉时为医学院讲师。

⑧ 徐诵明:《西北联合大学的解散》,《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24辑,“教育”,第146页。参见《张北海致陈立夫电》(1939年8月4日),新北,“国家发展委员会档案管理局”藏,教育部档案,A309000000E/0027/140.48-22/0001,第104页。

闻,敬希钧察。^①

这也就难怪徐诵明要在他的老根据地遭到“完全失败”了。

虽然在张北海眼里,此时的徐诵明如笼中困兽,到处碰壁,但徐诵明等北平大学旧人倒显得信心十足。本来,商学系俄文教授李绍鹏自1939年初便宣布不再上课,并把家眷送到四川,但在徐诵明一再挽留下,又只身返回城固^②;接替许寿裳担任历史系主任的李季谷,本已应聘到中山大学师范学院,徐诵明联手许寿裳,“恳切挽留,已荷同意”。^③徐诵明准备重振雄风,似乎看到希望。

就在徐诵明等人蓄势待发之际,陈立夫已决定釜底抽薪。8月4日,胡庶华给陈立夫连去两电,一封电报说:“西北联大改革条件已备,恳坚持部旨,贯彻到底,以为一劳永逸之计”^④,另一封则提出具体的人事安排建议:“(a)急迅直下,两个不留。(b)留李(蒸)去徐(诵明)。”^⑤陈立夫部分采纳了胡庶华的(b)计划。8月8日,行政院议决,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和医学院独立设置,分别改为国立西北师范学院与国立西北医学院,李蒸、徐佐夏分任院长,剩下的文理、法商学院合组为国立西北大学。^⑥西北大学一改联大的校务委员会制而为校长负责制,胡庶华任校长,徐诵明调任教育部医学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约在8月中下旬,张北海也离开城固。据说,张临走时也并不沮丧,倒是颇为得意地说:“我是一架轰炸机,现在任务完毕,安然返防。”^⑦

结 语

因在任教育部部长之前长期执掌国民党党务、特务系统,陈立夫1938年1月走马上任后,不少人担心“党化教育”将大为加强,教育部职员也猜测陈“势必多借重党里人才”。为打消人们的顾虑,陈立夫在蒋介石与其谈话时,便坚决辞去特务系统的职务,决心在教育部部长任上“以德服人”。^⑧然而,陈立夫毕竟是党国要人,其“以德服人”自有底线,借用胡庶华的话来说,那便是:“中央拿钱办教育,决不能容反对中央的人作教授。”^⑨

不过,即便出现触碰底线的情形,陈立夫仍然有其尺寸,国民政府1929年颁布的《大学组织法》便是其决策时不得不考虑的重要因素。《大学组织法》明确规定,大学各学院院长“由校长聘任之”,教员由“院长商请校长聘任之”,以校长为主席的校务会议有权决定“大学学院学系之设立及

① 《徐佐夏等致陈立夫电》(1939年8月5日),新北,“国家发展委员会档案管理局”藏,教育部档案,A309000000E/0027/140.48-22/0001,第106页。

② 《李绍鹏致西北联大常务委员会函》(1939年7月14日),陕西省档案馆藏,国立西北大学档案,67/2/66,第108页。

③ 《李季谷先生经挽留同意留校任职贵校约愿作罢》(1939年7月15日),陕西省档案馆藏,国立西北大学档案,67/2/66,第110—111页。

④ 《胡庶华等致陈立夫电》(1939年8月4日),新北,“国家发展委员会档案管理局”藏,教育部档案,A309000000E/0027/140.48-22/0001,第102页。

⑤ 《胡庶华杨立奎刘拓致陈立夫电》(1939年8月4日),新北,“国家发展委员会档案管理局”藏,教育部档案,A309000000E/0027/140.48-22/0001,第105页。

⑥ 赵弘毅、程玲华主编:《西北大学大事记》(修订本),第177页。

⑦ 吴世昌:《哀悼许季第先生》,绍兴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许寿裳纪念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64页。

⑧ 陈立夫:《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台北,正中书局1994年版,第219、238—239页。

⑨ 《西北联大发生驱逐反动教授风潮之前因后果》(1938年10月17日),新北,“国家发展委员会档案管理局”藏,教育部档案,A309000000E/0027/140.48-22/0001,第212页。

废止”。^① 面对法商学院的左翼化,陈立夫虽然权力基础雄厚,起初也无意公然置《大学组织法》于不顾,直接插手联大校政,而是寄望徐诵明,希望徐从联大内部入手遏止法商学院的左翼化。徐诵明因人事关系而与左翼师生更接近些,却也不愿看到左翼势力一支独大。徐清楚,这对西北联大并非好事。因此,徐努力在左右之间求得平衡,尽力避免给教育部插手联大留下口实。可惜,左右翼都不解徐诵明守护大学校政正常运行的用心,或有意或无意,都在逼徐站队。徐诵明想左右逢源,到头来却是左右为难。从联大内部着手解决问题的设想失败后,陈立夫不得不动用行政力量,安插张北海接管法商学院,以期彻底整顿。这自然要招致徐诵明和左翼师生的强烈反弹。双方博弈的结果,大批左翼教员被迫离职,张北海也被逼走。徐诵明拔掉了陈立夫打入西北联大的楔子,但自己也不得不离开耕耘 10 余年的大学。

由左右之争而引发校政巨变,这应该是全面抗战爆发后大学出现的新现象。全面抗战爆发、国共第二次合作后,大学左翼师生的活动半公开化或公开化,声势大涨。^② 国民党西北联大区党部注意到“共产党在法律上已不犯法,故青年均无所畏惧”^③,王治焘、孙宗钰也体会到,国共合作以来左翼力量利用“中央宽大之政”,不止是“喧宾夺主”,甚而“压迫”得“忠于党国之师生”无立足之地。^④ 而西北联大又于国民党在大学普设中央直属区党部之前领先一步,组建陕西省党部直属的区党部,国民党籍师生及其支持者得以团结起来。从此,左右之争从战前的“以学生对学生”^⑤发展到“以组织对组织”。这种以“以组织对组织”的左右之争又因西北联大的特殊历史而加剧。战前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即是左翼师生活动的重要场所,北平师范大学则是右翼实力较为雄厚。^⑥ 西北联大的设立,使两校之间的左右之争压缩到一个学院,烈度大增。左右两翼的政争再与人事纠葛叠加在一起,两者互相作用,双方人马不断强化自身立场,左右对立日益尖锐,终至不可收拾。在左右之争的大背景下,左翼师生要指点江山,右翼师生要保卫社稷,大学校政便难以为继。

[作者陈钊,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高莹莹)

^① 《国民政府颁布大学组织法》(1929年7月26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教育”(1),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第172页。

^② 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1937至1946年的北大、清华、南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36—443页;蒋宝麟:《中央大学的国民党组织与国共斗争(1927—1949)》,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3期,2011年9月,第27—28页。

^③ 《为呈请彻底整顿西北联合大学法商学院改正青年思想以利党前途事由》(1938年8月12日),新北,“国家发展委员会档案管理局”藏,教育部档案,A309000000E/0027/140.48-22/0001,第157页。

^④ 《国立西北联大法商学院院务报告》(1938年10月5日),新北,“国家发展委员会档案管理局”藏,教育部档案,A309000000E/0027/140.48-22/0001,第196页。

^⑤ 胡梦华:《CC的反动学生组织诚社始末》,柴夫编:《CC内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130页。

^⑥ 1936年,陈方澜同时考上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和北平师范大学文学院,因仰慕李达、许德珩等左翼教授之名,陈选择了法商学院。参见陈方澜口述,王礼民整理《难忘的几件往事》,中国民主同盟网站,http://www.dem-league.org.cn/mswx/1198/17418.aspx,2018年3月13日;于刚:《回忆“一二·九”时期的北师大》,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28卷,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206—209页;乔家才:《杨立奎独力斗学联》,《浩然集(四)——海隅丛谈》,第495—507页。